

优化考核导向 摒弃“规模情结”

从规模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正在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共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结,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返佣、“高息高返”等行为。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制造业拉动,呈现出信贷密集型 and 债务密集型特征。与此同时,我国金融总量增长较快。截至今年8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过460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超过270万亿元。由于上述行业的中长期融资需求比较旺盛,与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

更加适配,长期以来我国融资结构也由银行贷款主导。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多体现为优化结构,而非持续扩张宏观金融总量。从资金投向看,近十年来,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占比由60%以上降至10%左右,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的新增贷款占比则升至70%以上。仔细观察各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与行业增加值之比的指标不难发现,房地产业等传统领域行业的比值普遍大于1,也就是说,在该领域,每创造1元增加值需要投入更多银行信贷。相较之下,新动能领域行业的比值普遍小于1,信息服务业仅约为0.1,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银行贷款相对较少。

因此,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也需要从“拼规模”转向“比质量”。如果继续无视实

际需求变化、盲目“冲规模”,不仅不利于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还可能埋下新的潜在风险隐患。一是可能抬高信贷风险。例如,基层员工迫于完成“冲量”压力,在尽职调查不审慎、风险把控不严格的情况下,把贷款发放给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最终形成坏账。二是可能加剧“内卷式”竞争。各家机构卷规模、卷价格,从短期看,借款人可能获得了更低的贷款利率,但从长期看,这不仅扰乱市场秩序,还损害金融系统稳定,最终风险还是由实体经济承担。

但是,当前“规模情结”为何依然普遍存在且不易被扭转?这与亟待优化的考核机制相关。大多数金融机构总部对分支机构、基层员工的考核导向仍侧重于“数量”,因为相较于考核质量,数量既易于衡量,又相对客观,考核数量更为简单。但是,过于看重数量很容易扭曲一线员工的经营行为,甚至

偏离服务实体经济、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初衷。以发放一笔贷款与为企业办理一笔保函为例,二者本质上都是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且后者在解决借款人燃眉之急方面更具灵活性,但后者却往往不被纳入贷款增量考核。

接下来,金融机构应结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融资需求、贷款降速提质的变化趋势,从规模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深研细分赛道,从提供单一传统信贷服务,转向构建覆盖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综合服务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不断增强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适配度。同时,持续优化内部考核机制,让一线员工不再被迫“卷规模”“卷价格”,而是将目光放长远,从为企业解决急难愁盼的角度出发,制定更加合理的考核指标,在合法合规、审慎科学的基础上,确保金融服务提质效、可持续。

绿色金融精准赋能碳减排

绿色金融是支撑传统高碳行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持续引导绿色信贷流向环保、节能等领域,有力推动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

强化工具支持

为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中国人民银行发挥货币政策结构优化作用,持续推动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例如,拓展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领域。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优化碳减排支持工具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将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具有直接碳减排效应的项目纳入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表示,碳减排支持工具是中国人民银行创设的一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它按照金融机构自主决策、先贷后借的方式运行:银行先向符合条件、具有显著碳减排效果的项目发放贷款,再按照政策规定向人民银行按一定比例申请低成本再贷款资金支持。通过制度创新,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等领域。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将节能改造、绿色升级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具有直接碳减排效应的项目纳入支持领域,并明确该工具按季操作,每次提供一年期再贷款资金,全年操作量不超过8000亿元。

刘锦涛表示,扩围意味着政策支持正在从新能源等天然绿色领域,进一步延伸至传统产业设备更新和存量高碳行业或其他棕色行业改造。碳减排支持工具因此不仅能够促进绿色产业发展,也能够为传统行业平稳、有序、可持续转型提供金融支持。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表示,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作用是多层次的:对银行,降低了绿色信贷的负债端成本,提供了商业激励;对企业,可部分传导至融资成本,降低转型门槛;对整个体系,它构建了“定向降息”的绿色通道,精准引导金融资源向碳减排领域倾斜,是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力的典范。

创新金融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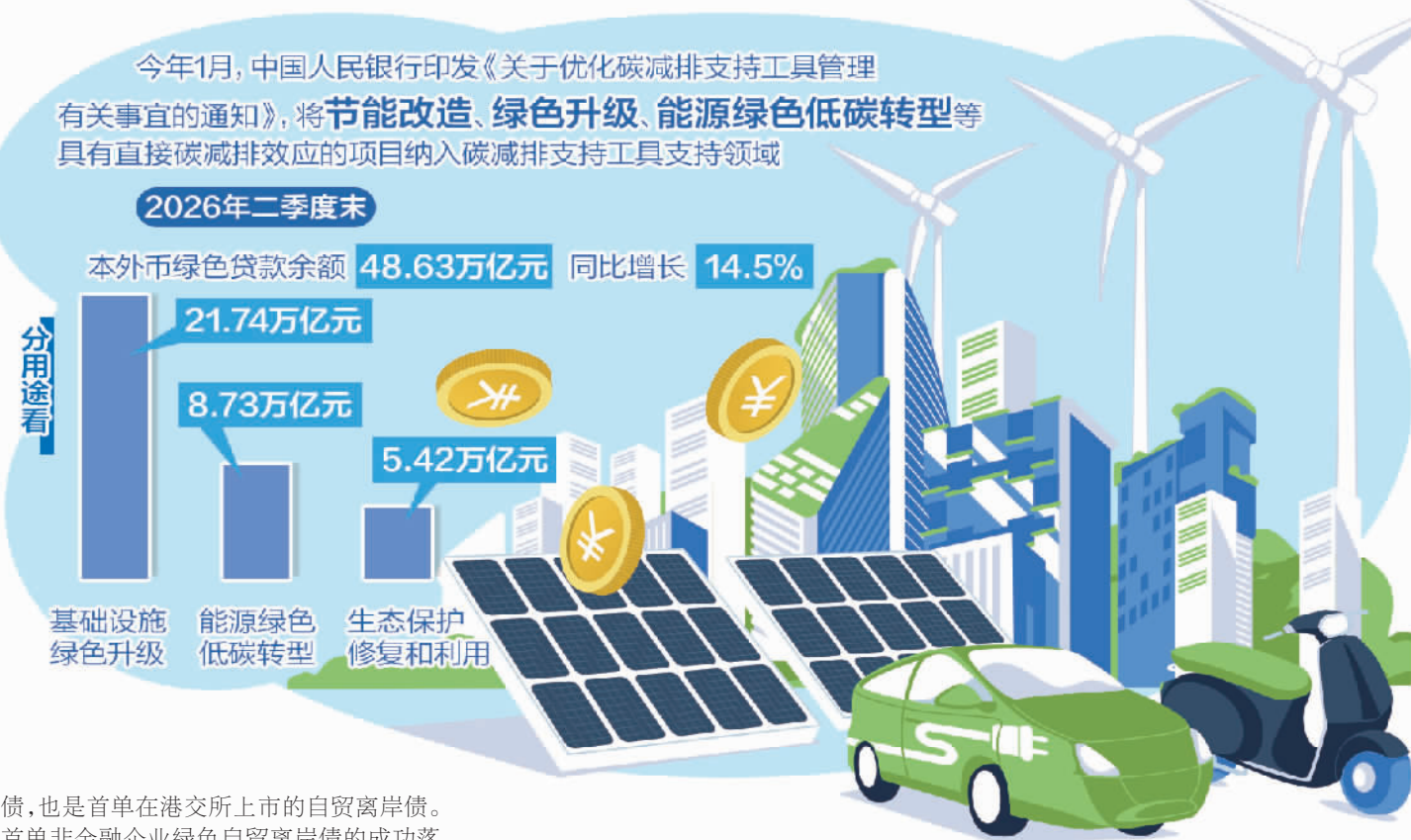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有效发挥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估激励作用,加强高质量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产品服务供给。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上半年增加3.82万亿元。

薛洪言表示,我国绿色贷款近年来保持较快增长,说明金融资源向绿色领域的倾斜配置已形成结构性趋势。更关键的是,信贷投向从早期集中于清洁能源,逐步向绿色工厂、节能技改等更广泛的实体经济场景延伸,意味着金融支持已从“支持绿色产业”深化到“推动产业变绿”的阶段。配合绿色金融评估机制的完善,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越来越注重绿色低碳,不再停留于简单的规模增长。

银行加大信贷供给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金融产品创新。比如,转型金融、碳金融工具、绿色债券等,不同类型的银行机构正依托自身优势,优化信贷供给与服务。

首先,大型银行资金实力较强,期限管理能力较好,重点服务新能源基地、绿色交通、新型电力系统和重大节能改造项目,综合运用绿色债券承销、并购融资和供应链金融,为重大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例如,建设银行近日协助上海电气环球资本有限公司成功发行15亿元人民币绿色自离岸债,期限3年,票面利率1.8%。本笔债券是市场首单非金融企业自离岸岸



债,也是首单在港交所上市的自离岸岸债。首单非金融企业绿色自离岸岸债的成功落地,进一步丰富了上海自离岸岸债市场生态,拓展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应用场景。

建设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募集资金将精准投向绿色低碳产业领域,为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再添创新性融资工具。建设银行依托集团全球化布局与境内外协同禀赋,以发行人、承销商、托管行、投资人“四位一体”全链条参与自离岸岸债市场全生命周期建设,落地一批具备标杆示范意义的突破性首单项目,为“走出去”企业拓宽跨境融资渠道、降低境外融资成本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张娆表示,大型商业银行通过创新金融产品,聚焦生态治理等重点资产长期大型绿色项目,发放长期绿色贷款、绿色技改贷款、大额银团贷款、绿色债券等,有助于全方位、全链条、体系化提供绿色金融服务。

其次,区域性银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侧重立足本区域、服务本地,开发场景式绿色金融产品。针对纺织企业设备更新、节水减排、循环印染等转型需求,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内长兴农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转型金融改革为突破口,创新推出纺织转型贷,建立碳效等级挂钩利率机制,全方位支撑纺织产业从高耗能粗放生产向绿色智造迭代升级。

刘锦涛表示,中小银行更接近地方企业,要考虑推出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对象的适配性,重点解决中小企业绿色改造项目小、抵押物不足、减排数据不完整等问题。可以依托地方绿色项目库、企业碳账户和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发展设备更新贷、节能技改贷、分布式光伏贷等标准化产品。

防范“洗绿”风险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较快,纯绿项目容易识别,但在推动转型金融发展过程中,个别传统企业通过虚假项目骗取低成本的绿色信贷,贷来的资金并未真正流向低碳项目。防范“洗绿”或者“漂绿”,关键是把风险管理贯穿贷前、贷中和贷后全过程。刘锦涛表示,银行在贷前要解决它是不是真绿的问题。金融机构不能只看企业提供的绿色标签,而是要核实资金用途、技术路线、预期减排量和转型计划。对于转型金融项目,还要区分真正的节能降碳改造与借转型之名扩大高碳产能。贷中要解决资金有没有如期

且按约使用的问题,可以通过专户管理、分阶段放款以及能耗数据监测,防止绿色贷款被用于一般性经营或高排放项目。

贷后则要解决是否真正产生环境效益的问题,也就是去核转型结果。刘锦涛表示,应定期核查项目能耗和碳排放变化,对减排效果与承诺严重不符的项目,及时调整利率、停止后续放款或者取消绿色认定。

此外,还应强化碳排放核算、信息披露,加快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避免标准或依据不统一给“漂绿”钻空子。为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健全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绿色金融支持项目

目录(2025年版)》,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薛洪言表示,银行应以新目录为核心的标准体系作为降低识绿成本的工具,嵌入信贷审批全流程,实现绿色分类的精准匹配。在此基础上,基于不同活动的技术指标设计差异化的利率定价模型,并开发与碳减排绩效挂钩的贷款产品,使融资成本随企业降碳成效动态调整,将标准从合规负担转化为商业工具。

接下来,要加强标准与金融政策的联动。刘锦涛表示,绿色金融标准不应只是统计分类工具,还应与绿色金融评价、结构性货币政策和风险管理相衔接。符合高标准、能够产生真实减排效果的项目,应获得更多金融资源。

近期,国际铜价连续刷新历史新高。9月9日,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盘中一度升至每吨14858.5美元,再创历史新高,随后有所回落。国内沪铜主力合约同步站上每吨11万元关口。今年以来,国际铜价累计上涨约17%,近12个月涨幅达到47%。本轮铜价上涨,既受贸易政策预期、库存迁移、供给扰动等短期因素拉动,也折射出铜市场供需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期货价格走强的同时,现货市场紧张信号持续显现。铜精矿加工费在负值区间运行,“加工费”转为“倒贴费”;国内电解铜现货库存降至9.71万吨,创年内新低。废铜市场同步升温,部分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出现采购商驻场收货、现货快速成交的情况。库存处于低位、铜精矿供应偏紧、加工费持续承压,多重信号显示现货市场紧张程度上升。

短期来看,美国精炼铜关税预期引发的全球库存重新配置,是近期铜价上涨的重要催化因素。市场担忧美国未来扩大精炼铜进口关税,部分贸易商提前将铜运往美国,库存向美国市场集中,欧亚市场可流通货源相应收紧。叠加主产区生产扰动,现货偏紧预期进一步强化。关税、库存和资金等短期因素交织,使铜价波动明显加大。

比短期因素更值得关注的是需求结构变化。过去,铜作为典型工业金属,需求和房地产、传统制造业景气周期紧密相关。当前,新型电网、新能源汽车、储能等领域持续扩大用铜需求,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建设又带来新的增量。算力基建除服务器外,还配套变压器、电缆、母线及供电系统。据机构测算,新能源汽车单车用铜量明显高于传统燃油车,算力密度提升,也推高数据中心供电、液冷环节对高端铜材的需求。随着数字化、电气化加快推进,铜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需求来源更加多元。

华夏基金相关负责人表示,本轮铜价上涨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短期看,关税预期引发全球库存重新配置,叠加主要产区供应扰动,加剧了现货紧张;中长期看,AI算力、新型电网、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用铜需求持续增长,而铜资源供给增长相对缓慢。与以往主要受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周期影响相比,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影响铜需求的重要变量。

需求端不断拓展,供给端却难以快速响应。全球最大产铜国智利今年二季度铜产量同比下降7.7%至127万吨,创2007年以来同期最低,全年产量预期同比下降2.6%。刚果(金)今年6月底进一步收紧铜精矿出口管理,原则上禁止铜精矿和钴精矿出口,进一步增加市场对原料供应的担忧。铜矿开发本身具有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从勘探、建设到形成稳定产量往往需要多年,老矿品位则在逐年下滑,供给弹性先天不足。智利国家铜业委员会预测,2026年全球精炼铜市场盈余仅为1.2万吨,在年消费超2800万吨的市场里,供需缓冲空间较为有限。

铜价高位运行,也在向国内产业链不同环节传导。对于拥有资源储备的上游矿企,铜价上涨带来较大的盈利弹性,江西铜业上半年归母净利润86.32亿元,同比增长106.77%;与之相对,冶炼企业受铜精矿供应偏紧、加工费走低影响,盈利空间受到挤压;电线电缆、家电、装备制造等下游行业则面临原材料成本上升压力。再生铜利用价值随之提升,一些企业通过提高再生原料占比缓解原料约束,行情数据显示,今年国内废铜收购价格同比上涨超20%。铜价上涨并非简单利好整个产业链,而是在不同环节之间重新分配成本和收益。

高铜价之下,增强资源保障和产业链韧性更加重要。“算力相关的铜、铝、锡等品种上游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海外供应扰动频繁已成为新常态,企业应在海外权益矿、再生回收、长协采购等方面形成组合安排。同时,还应加强上下游供需对接,提升产品对新兴产业需求的适配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兼重金属部主任段绍甫表示。

铜价创新高,是全球资源供需变化的一面镜子。短期关税、库存与市场情绪仍可能带来较大价格波动,但数字基建、电气化、能源转型催生的新增需求,叠加供给弹性不足,将持续影响铜产业。对国内产业而言,比起预判行情高低,更重要的是强化资源保障、循环利用与风险管理,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为数字化、电气化发展提供更加稳定的基础资源支撑。

本版编辑 姚进美 编夏祎

国资并购重组着眼强链补链

□ 本报记者 赵东宇

升全球竞争能级。

国资并购市场的活跃,背后是政策的不断完善。今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支持中央企业“获取核心要素、抢占技术先机,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此外,国务院国资委修订印发了《企业国有资产交易操作规则》,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制度,为国资并购提供了更明确的制度规范。

从可持续性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整合提质、补链强链需求长期存在。普华永道预计,下半年我国并购市场有望延续活跃态势,硬科技整合、国企改革等交易将成为结构性增长的主旋律。

刘彪表示,国资是适配硬科技发展的核心耐心资本,能有效弥补市场化资本短期失灵的不足。国资战略定力突出,可以跳出短期财务回报束缚,敢于承接前沿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试错成本;同时抗周期能力强,可在行业低谷时守住核心技术人才与基本盘。在并购重组中,国资擅长打造产业生态纽带,以并购整合技术、资本、场景资源,同时发挥牵头作用,依托战略兜底提振市场信心,引导社会资本跟进和共同参与。

前不久,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典型案例汇编》。梳理发现,央企及地方国企主导的整合占据了较大比例,聚焦央企专业化整合、产业链强链补链、硬科技自主可控等方向。其中,中国船舶吸并中国重工,以约1151.5亿元的交易规模成为A股史上最大的吸收合并项目之一,两家千亿级船舶总装平台合二为一,打造出手持订单领跑全球的船业旗舰;华电国际一次性注入分布于上海、广东、广西、江苏四地的8家清洁火电公司,约71.67亿元的交易对价采用“股份+现金”组合,国有资本加速向能源主业主链集中;芯联集成收购芯联越州,成为“科创板八条”发布后的首单收购未盈利资产的过会项目,为硬科技并购开辟了新的通道。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认为,这些案例反映了国资并购重组在跳出简单规模扩张、推动系统性产业整合上的积极进展。通过同业整合,集中研发力量、产能、订单,优化资源配置;对硬科技赛道精准赋能,推动关键技术产业化落地;依托国资筹优势对冲外部技术封锁风险,筑牢供应链安全。同时,整合零散经营主体,扭转国内企业低价内卷、国际议价弱势的局面,提

近日,华谊集团以18.42亿元完成对江化微23.96%股权的收购过户,江化微的实控人从山东淄博市财政局变更为上海市国资委。江化微生产的湿电子化学品用于芯片制造过程中的清洗和蚀刻,是半导体产业链的关键材料之一。作为国内半导体产业重地,上海在湿电子化学品这个环节一直缺少具备规模优势的本土企业,这笔收购正好补上了这一缺口,也为国有资本主导的专业化整合提供了一个新样本。

普华永道发布的《中国企业并购市场2026年中国回顾及展望》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并购市场交易宗数达7316宗,同比增长近30%,交易总额2416亿美元,同比增长56%。在27宗超大型交易中,境内战略投资类占14宗,超半数由国资主导。从行业维度看,高科技领域超大型并购交易频现,资金流向高度集中,交易额同比增长近2倍;能源行业受大型国资重组提振,交易额实现翻番增长。半导体、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头部企业横向整合与产业链协同全面提速。并购资金正加速向围绕新质生产力、产业链强链补链的方向集聚。